

发生学视野下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背景的历史解读^{*}

潘信林

(湘潭大学 管理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在发生学视野下解读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历史背景,要深入考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新的探索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发生历程;要全面考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和思想背景;要细致考察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是如何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发生学;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历史解读

[中图分类号]A841.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07)04-0001-07

发生学的观点是把事物的微观状态与宏观状态放在统一的语境中(Context)、环境中来动态、系统地观察、考虑、研究。“具体地说,就是把生物学和物理学重新装到一起,把必然性和偶然性重新装到一起,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重新装到一起”^[1]的观点。它是一种以事物间的相互作用、事物的高级运动伴随着低级运动(恩格斯)、建构主义(皮亚杰)、行为主义、劳动创世说(马克思)以及混沌学谈论的耗散结构作为事物发生的基本结构的观点(伊·普里戈金和伊·斯唐热)。发生学认为任何规范和价值都是在发生着,而且也只有当它们是发生的时才有意义。因此,它主张在不断的积极否定中肯定变化,而不再谈论什么事物是永恒不变的,这与马克思主义运动是永恒绝对的观点发生了共鸣。发生学的观点为我们了解“思想发展和变革的真实心路和源起性语境”,^[2]重新历史地解读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背景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发生学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生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重大继承和发展的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同样是发生的。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一种主观范畴它是发生在毛泽东所处的特定年代,是对当

时发生着的经济基础的客观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起来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它必然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发生历程;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思想体系它必然有着不同于一般思想的发生背景和发生情境,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如此,或许可以再现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本真语境、真实形态和全程式过程。

一、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过程背景

发生学认为任何事物的发生都是由混沌走向秩序,从低级走向高级,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也有这样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毛泽东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它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新的探索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发生过程。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伊始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尚处于萌芽时期。一方面,毛泽东

· [收稿日期]2007-04-26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05-0708)。

[作者简介]潘信林(1982-),男,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和政府绩效评价研究。

逐渐摆脱对康有为、梁启超等君主立宪和改良思想以及欧洲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牢笼和束缚,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认识。另一方面,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吸取了先进的行政管理思想,尤其是巴黎公社的伟大尝试给了毛泽东极大的鼓舞和信心。

在整个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1947年秋季以前),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逐渐形成。主要的原因,一者在于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在理论上的逐渐成熟,实际上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成熟时期;再者在于毛泽东具备了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1930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当选为主席,开始了地区行政管理。后来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让毛泽东“安心”从事后方工作,主要是根据地的行政管理工作。这种“左”倾错误不久即被证明是危险、盲目而代价惨重的,但是经历这一错误后,毛泽东的威望在党内和红军当中反而有所提高,遵义会议随即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而且这一时期的“靠边站”也为毛泽东积累了丰富和宝贵的行政管理实际经验。土地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1947年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行政管理工作实际上还只是一种地区的行政管理,其所管辖的区域尚局限于根据地而不是全国的范围。

但是一些重大的变化在1947年不可阻挡地发生了。1947年2月,毛泽东即预告全国人民“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也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到新的人民大革命阶段。”^[4]这个新的阶段也是国家行政管理的序幕。其标志性文献是1947年秋毛泽东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所指示的:“在一切新老解放区必须坚决实行土地改革(这是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最基本条件),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事工业的建设,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4]其标志性事件是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于时年(1947年)六月强渡黄河,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华北野战军进如豫皖苏地区;晋察冀野战军在平汉作战;东北野战军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军事上全国范围内的大进攻,必然要求全国范围内的通畅的行政管理予以确实的支持和保障。这也标志着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已由一地区的局部经验上升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行政管理。1947

年秋季至1954年前是毛泽东领导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时期,也是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重要发展时期。其重要事件是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其标志性事件则是发生在1952年的大区合并,将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六大区域性地方政府撤销。这一时期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由原来的地方微观管理体制转变为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新体制设计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与关系。

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成熟则是1954年新宪法制定以后及当时的国家行政管理改革。当时“改政院为国务院,撤销了四个综合性委员会;设立了分别协助总理处理政务的8个办公室;对部委进行了较大调整,设立了24个主管部门。”^[5]各级地方政府比照中央政府对口设置了厅、局,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以中央为主的、与计划经济相一致的部门管理体制。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这次改革奠定了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模式。^[5]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家行政管理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也由此进入到了全新而艰辛的全面探索时期。在实践领域,先后有1958年至1959年的大规模行政管理改革(发生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1965年的改革(发生在克服1959—1961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以及“文革”时期非正常的大规模行政改革。在思想领域的显著标志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时期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健全能够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积极性的行政管理体制。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及建国初期,毛泽东思考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如何建立中央政府的权威。这种思考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发生了重要转变。随着对借鉴而来的苏联中央集权体制的反思以及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提出了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允许搞点地方王国,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利益。《论十大关系》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对行政管理体制的新思考,即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调整中,既维护中央的权威,又适当地分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国应该学美国把责任和财富分散到五十个州的那种发展办法,中央政府不能什么都干。中国必须依靠地区和地方的积极性。”^[6]在

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中央必须代表、维护整个国家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同时兼顾、尊重和保护地方利益。在集权体制下,毛泽东号召地方要向中央力争地方利益,“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7]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毛泽东主张在中央统一领导,全国一盘棋的前提下,各地“因地制宜,各搞一套”,坚持统一性和独立性的有机统一。要在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博弈中,在科学集权与适当分权和调整下,调动两个积极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地方相当大的自主权,以便地方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灵活自主地开展,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则集中精力,管好全国的事情,加强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而尽量少直接干涉地方事务,保护地方的积极性。

二、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宏观背景

发生学要求将事物的宏观状态作细致的考察,科学认识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就必须系统研究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等宏观背景。

马克思主义者总是自觉地把经济基础放在显著而首要的位置,并时刻不忘强调它的决定作用和基础作用。正如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一样,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经济基础也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当然它的不容置疑的最主要的经济基础首先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它的生产力是较为发达的,它的生产关系则是十分灵活、自由和富有生命力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的经济生机是催人奋进的,但是因为战争的环境和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先进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得到应有和充分的发挥。即使到了全国即将解放的 1949 年,整个经济非但不能让人放心,反而令人更为担心,当时西方世界就曾普遍地“乐观”宣布“共产党中国将在军事斗争的胜利下迅速在经济建设中毫无希望地失败”。

虽然整个经济的实际状况和总体实力不应该被不切实际地夸大,但是整个经济的前景则不能不令人充分而自信地乐观和振作起来。毛泽东本人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本国情,^[8]并乐观地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

的画图。”^[9]这样的经济背景及其现实状况迫使毛泽东在行政管理中不得不重视生产建设,关注经济建设,从而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经济性。实际上,早在 1940 年毛泽东就设想并规定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1945 年,在中共七大毛泽东更加透彻地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政策:在土地问题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则与他所称赞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取得了同样的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他说,“在现阶段上,完全同意孙先生这些主张”,^[10]根据毛泽东 1947 年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央政府研究制定了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其中在经济政策方面,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大纲领作了新的概括,“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11]1949 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1]

国家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	国家		钢铁产量(万吨)
一九四九年	美国	1885 美元	一九五二年	美国	8452 元
	西德	487 美元		苏联	2449
	英国	717 美元		日本	699
	法国	689 美元		英国	1668
一九五二年	中国	176 元 (人民币)	印度	160	
			中国	135	

本表格根据王培理、郭德宏主编的《共和国经济大决策》(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年版)相关资料编制。

马克思主义者在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的作用的同时,还强调了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架构能动的反作用,20 世纪前中期世界和中国政局扑朔迷离的变化是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产生和形成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考察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必须结合整个世界和中国的政局态势,事实上,毛泽东本人

也有着这种自觉。一方面,在中国而言,毛泽东的行政管理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充分的分析基础之上的,那便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12]在世界而言,毛泽东则真真切切地响应并力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统治。这种分析为后来在各个时期建立起真正的合时宜的革命统一战线和“三个世界”的理论划分准备了坚实的阶级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世界政局动荡,“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相互之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乱,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13]帝国主义争相宰割中国和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明争暗斗所造成的混乱、复杂、耻辱的政治局面使毛泽东具有深刻的民族危机感和阶级敌友感,从而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和阶级性。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民族性突出表现在毛泽东再三强调必须建立“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行政管理体制,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阶级性则集中表现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上。世界范围内的扩军备战以及长达六年之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首先它使中国逐渐脱离英美体系(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的反动政权)而最终站到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此外,长期的革命斗争、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使毛泽东长期将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权作为行政管理的中心和主要任务。这对毛泽东晚年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轻视经济建设、忽视民主建设,产生了不易觉察且负面作用不可忽视和否认的深刻而巨大影响。

上层建筑除了政治架构外,另外一个地位重要而作用巨大的主要内容就是文化。从时间的角度来考虑,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文化背景无疑是最浓厚的,因为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但是浓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毛泽东一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就用在批判地吸收和继承传统文化上面。一方面,传统文化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贵民轻君重社稷、

亲民廉政、勤政爱民、行教化、施仁政的思想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服务性。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官本位思想、裙带作风、宗派思想、小山头主义、专制家长作风、腐败思想也使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伤透了脑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后,文艺界也是处于迷茫和探索的新时期,这时期并没有明确的文艺宗旨和方针。1940年,毛泽东写《新民主主义文化论》时,就讲到需要一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必须打倒反动文化,树立进步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14]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指明了方向,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开辟了文艺战场并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1956年,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为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持和智力保障,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艺方针。此后毛泽东长期致力于构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5]“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上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16]毛泽东指出,行政管理文化必须是来源于人民群众,贴近于人民群众,关心并服务于人民群众;必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融洽干群关系,使政府真正成为人民的政府,真正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真正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革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发展和完善。

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及其从事行政管理的时代还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碰撞的年代。“中国先进的人们”至少在以下四种思想备受煎熬:康有为、梁启超为国家富强而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政治制度,鼓吹君主立宪;孙中山先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以及当时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时期中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思想尽管遭遇空前的质疑和批判,但在谋求民族自救和国家富强的原则问题上也在自觉地贡献思想的智慧。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作为行政管理的根本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的这种

选择并不是纯粹的,也就是说,他既设法保留了中国传统行政思想的精华并对之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使之马克思主义化;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他强调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17]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行政管理的历史传统,以丰富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行政管理实践为基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仅就思想层面而言,它是发生与在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发生在与脱离先进思想指导的经验主义、盲动主义的斗争中,发生在与错误的“左”倾思想和右倾思想的斗争中,发生在与封建专制思想和标榜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及无政府思想的斗争中。这种思想情境既为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发生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准备了光明的前途,也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成长之路充满了艰辛和挫折,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预言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18]

三、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发生的微观背景

考察一种思想的发生选择宏大的历史背景显然是恰当而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忽略微观因素则显然是有失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和历史学家的责任意识。发生学认为,“在远离平衡的状态下我们发现,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可以被放大成巨大的破坏结构的波澜。而这就带来了一切种类的‘本质’的变化过程或‘革命’的变化过程。”^[19]这就要求将事物的微观状态融入宏观状态作系统、整体的考察并注意微小变化的“蝴蝶效应”(中国蝴蝶扇扇翅膀,美国可能刮大风,或者反过来),科学认识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就必须认知毛泽东的个人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蝴蝶效应”。

广博渊深的学识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传统价值和民族色彩。毛泽东广博渊深的知识为他从事行政管理提供了种种便利,也为他创造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准备了坚实的知识背景。“他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现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20]“据不完全统计,进城后(1949年)到1966年9月,

毛泽东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阅的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仅1974年一年,借阅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的书刊就有近600余种,1100余册。”^[21]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为毛泽东资史鉴今,博古晓今,借鉴历史上行政管理的得失和经验教训,创造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准备了深厚的知识基础、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民族背景。毛泽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乳养下产生的民族的领袖、世界的巨人。周恩来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毛主席开始很喜欢读古书,现在主席做文章、讲话,常常运用历史经验教训,运用得最熟练。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的确如此,六年的私塾为毛泽东打下了十分深厚的古文功底,使他的知识更广博,使得以他的思想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从内容到形式,都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是从人民当中生长出来的,是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连的,是跟中国的大地、中国的社会密切相关的,是从中国近百年来和‘五四’以来的革命运动、多少年革命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产生的人民领袖。”^[22]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钟爱和眷恋不是盲目而无限制的,而是理性的、反思的、批判的,他曾指出:“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些,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23]正确的办法是毛泽东采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大力继承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既“古为今用”又“洋为中用”,建设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行政管理体制。

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经验色彩和实践特征。正如前文所述,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发展、逐渐完善起来的,它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成熟和新的探索这样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发生过程。在这个不断发生的过程中毛泽东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管理实践经验,这是毛泽东创建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的根本实践基础,也是毛泽东超越陈独秀、孙中山等人的重要基础。陈独秀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任何人。”^[24]毛泽东曾称赞陈为“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坚精神”,“他是有功劳的。他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25]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

和党的发起者。^[26]陈独秀后来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根本地可能在于他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双重性认识不足;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与软弱性估计不足;对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与叛变准备不足。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讲,一则可能在于他只是个优秀的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宣传者而缺乏革命的斗争经验,二则可能在于陈独秀当时并没有行政管理实践经验。毛泽东继承了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发展了陈独秀作为主要创建者的党的组织,并且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陈独秀、张闻天、王明等人因理论和经验的欠缺也就无法创建科学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系。与陈独秀并肩的“南陈北李”还有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李大钊。李大钊是我党早期先进的理论家和杰出的实际工作者。李大钊热情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组织建党工作,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但在1927年英勇就义,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他的先进思想为毛泽东所继承和发展,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法案,并设计了“军法之约、约法之约、宪法之约”即有步骤地实行“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方案以实现中国为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孙中山乐观地期待“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唯有,便是学说史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27]但是孙中山先生的乐观随着袁世凯的窃国复辟之举和他本人义愤填膺的护法运动的失败而迅速烟消云散。孙中山的一些行政思想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但因其阶级的局限性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富国强兵的道路和因其所领导和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最终流于破产。因此其思想也只能是思想,是不多见的学说。相反,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是毛泽东对中国行政管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创造,既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更能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巨大的理论创造力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具有巨大的理论张力,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1920年冬,……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不仅表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重要观点的坚

持和继承,也表现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和巨大成就。1938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28]‘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29]这实际上就是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理论创造。理论创造的目的并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使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李达回忆说:“当时的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阶级斗争说,大体上是懂的,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具体应用,却是不会。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工作,却还不曾开始。但在这一群人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那就是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他阅读那些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著作,总是细心体会,那些著作中的理论在中田究竟如何应用?如何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他每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总能得到相当的益处,最主要的地方,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去读,这是别的同志所不及的地方。”^[30]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这种不囿于前人,不迷信权威,实事求是的巨大理论创造力使毛泽东行政管理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方向,又具有巨大的理论张力,能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 [1][19] (比)伊·普里戈金,(法)伊·斯唐热.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5.13.
- [2]张一兵.回到马克思[M].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
- [3][4][11]毛泽东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1.1211,1233,1428.
- [5]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576.
- [6]毛泽东.自述[M].人民出版社,1993.22.

- [7]毛泽东. 选集(第 5 卷)[M]. 人民出版社, 1974. 271.
- [8]王瑞璞, 郭德宏. 共和国经济大决策[M].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 [9]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 年 4 月 15 日)[J]. 红旗, 1958, (1).
- [10][14][15][16][17][28][29]毛泽东选集(第 2 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 678, 695, 708~709, 708, 708, 534, 707.
- [12][13]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 3, 100~101.
- [18]给江清的信[N]. 1966-07-08.
- [20]戴木才. 毛泽东人格[M].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232.
- [21]雷国珍. 毛泽东大成智慧[M].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1, 11.
- [22]周恩来选集(上卷)[M]. 人民出版社, 1980. 331-332.
- [2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 人民出版社, 1988. 747-748.
- [24](美)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M].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125.
- [25]‘七女’工作方针[N]. 人民日报, 1981-07-17.
-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368.
- [27]孙中山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87.
- [30]毛泽东. 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若干特点的文史[J]. 湖南党史通讯, 1983. (13).

(责任编辑:朱德东)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o Zedong administration thought background under embryology viewpoint

PAN Xin-lin

(Management College, Xiangtan University, Hunan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o Zedong administration thought historic background under the embryology viewpoint should deeply study the producing, forming, developing and perfecting process of the Mao Zedong administration thought, should make new exploration for its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process, should overall examine the economic, political, cultural and idea background and should, in detail, study how the personal factor of Mao Zedong plays non-neglecting role in the background.

Keywords: embryology; Mao Zedong; administration thought; historic interpretation